

「行入」慈濟大藏經

——以慈濟落實「社區倫理」的環保志業為例

釋昭慧*

摘要：

慈濟從「全球」的環保志業，落實到「在地」的資源回收，然後又從「在地」的資源回收，落實到作為「全球」賑災用途的高科技寶特瓶毛毯。它是一個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最佳實例。

在資源回收與處理作業的在地環保志業中，我們看到慈濟人落實「社區實踐倫理」的成功典範。所有一連串的運作機轉，具體呈現出身心靈、家庭、社會乃至土地的療癒成果，總體效益很難作精準的量化表述。

因此本文作者以「佛教局內人」與「慈濟局外人」的雙重身份，略述「宗教」與「環保」之間，教證、事證與理證之間，「佛心」、「師志」與「己行」之間，「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邏輯辨證的層層環扣與串串鏈結。

關鍵詞：慈濟環保志業、教證、理證、事證、佛心師志、行入、社區倫理、全球化、在地化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文理學院院長

**“Acting out and Adhering to” Tzu Chi’s Buddhist
Scriptures**
— A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Ethics”
in Tzu Ch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ssion

Shih, Chao-hwei *

ABSTRACT:

Tzu Chi serves as the best example that balance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its efforts to implement its miss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orts have been developed as a “global” mission, while its action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its efforts to recycle within all “local” communities. In turn, such benevolent acts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form its recycled “local” resources into “global” disaster relief items such as its high-tech blankets made from PET bottles.

We see in Tzu Chi a successful example that demonstrates how its volunteers carry out their “community practice ethics” through a series of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perations to recycle and process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he whole set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 produces concrete healing results for the body, mind, and spirit of individuals, their families, the whole society, and even the earth. Its overall benefits cannot be measured or described with precise quantitative terms.

Thus, with a double identity as “a Buddhist insider” and “a Tzu Chi outsider,” the author shall map out the logical and dialec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nections among scriptural evidences, factual proofs, and logical support, connections among “the Buddha’s mind,” “the mentor’s will,” and “the paths of ourselves,”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connections between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words: Tzu Ch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ssion, scriptural evidences, factual proofs, logical support, the Buddha’s mind and the mentor’s will, acting out and adhering to, community ethic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一、宗教環保的「教證」與「理證」

當代各種投入環保運動的宗教家，往往依其古老聖典，作出文本的詮釋與分析(簡稱「文本分析」)。這是在為「人類應如何看待生態環境」，尋求權威性的經典依據。這些宗教家甚至不排除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如核能發電、基改作物、溫室效應等等，而作出教典的再詮釋，好能作出倫理判斷(知)，尋求解決之道(行)——就佛教術語而言，這類文本分析，屬於各該宗教環保理念的「教證」。

其次，各宗教內部的思想家(神學家)，也各自建構其生態哲學(或生態神學)。此中依當代西方所分類的生態哲學，大抵可區分為三種主義：

一、「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將人類價值高推到所有生物與無生物的頂極地位，例如：西方主流哲學高推人的「理性」，西方主流神學高推人的「神性」，因此大抵認為：只有人類具足「目的價值」，其餘生物與無生物只有在滿足人類需求和利益的前提下，才具足其「工具價值」。

這種西方主流神學與主流哲學的思維，影響到了啓蒙運動以來的西方科技研究，以及資本主義思維下的畜牧業。迄今每日全球有數以億計的生靈，被捉來作動物實驗，或是被關到集約農場，牠們備受種種楚毒酸切的殘暴凌虐，求生不得而求死不能。東方科學界竟然毫不猶豫地，延用著動物實驗的法定程序，並且同樣視此作為必不可少的「標準作業程序」，這真是不折不扣的全球人心大淪陷，全球業力大黑洞！

二、「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c Ethics)：主張自然世界的整體生態系統，含生物與無生物，都具有其目的價值，並依生態系整體的永續性運作，來決定個體的角色和地位。如當代部分西哲所提出的蓋亞理

論、土地倫理、深層生態學等等，以及部分非主流的生態神學，或是對中國天台學中「無情有性」論的再詮釋。

三、「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c Ethics)：主張眾生平等，每一種生命的本身就具有其尋求生存與快樂的目的價值或內在價值（而非工具價值），如當代經驗主義西哲所提出的動物解放、動物權，以及佛教的「護生」主張。

然而佛法看待「生命」與「生態」的寬廣角度，使得它無法被全然歸納為其中一種主義。我們只能說：

一、佛法近似生命主義：本諸推己及人而憫念眾生的悲懷，佛陀強調「護生」的重要性，並且反對暴力，這點近似「生命中心」的個體論。

二、佛法近似生態主義：依「緣起」法則，佛陀強調萬事萬物的相依共存、同體相關，此即中國俗諺的「牽一髮而動全身」，以及生態學上的「蝴蝶效應」原理，因此佛法又近乎「生態中心」的整體論。

三、佛法絕非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並沒有特權，因為依於無常法則與業力法則，所有眾生都依於他們的心念、言語與行為，而招感到不同的生命形態。作為進入「人道」場域的人，他必須理解此一進、退場機制，否則還是會依不善業而從「人道」退場，招感到低劣、苦難的生命形態，是為「自食其果」。

但是另一方面，佛法依然強調「人身難得」。因為眾生必須進化到知、情、意較為發達的程度，才有進入「人道」場域的機會；較諸其餘眾生，人類能作出相對良好的事實判斷（依於理智）、倫理抉擇（依於情感）與價值體現（依於意志）。因此佛陀說法，也以人類為主要的教學對象。當然，人類之中也有例外情形，那些患有精障、智障的人，或是胎兒、嬰孩、植物人等，並不見得比猩猩、貓狗或豬牛、雞鴨，更具

足知、情、意上的優勢。因此以人類的「理性」，片面證成人類的優越地位，業已在事實判斷上，產生了嚴重的錯謬。¹

各宗教依其文本分析作為「教證」，會進一步建構出系統理論的生態哲學（或生態神學），進而作出種種論述（更精準地說，是論述分析）²——就佛教術語而言，這就是各該宗教環保理念的「理證」。

即便是原本被視為對環境並不友善的宗教，面對迫在眉睫的現實需求，察覺到事關人類或眾生禍福，他們也還是可以對既有的宗教觀念再作省思，然後透過前述的聖典再詮釋以及理論再建構（亦即：依於適切的「教證」與「理證」），來改變他們對待生態環境的態度。此中，美國環境倫理學大師 Holmes Rolston III（1932—）就是一位絕佳範例——他以科學家、基督教牧師而兼哲學家的三重身份，跳開了西方主流神學與主流哲學的思維模式，建立起生態主義式的神學論述。

只要「教證」與「理證」充分而有說服力，那麼各該宗教的環保論述，就具足了權威性與正確性，讓信眾付諸生活實踐與群體事工。具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宗教團體，甚至可以在各自關切的環保議題上，投入（乃至主導）各項議題的環保運動。

二、宗教環保還要加入「事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各種宗教團體推行環保運動，並不必然是

¹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孟祥森、錢永祥譯，《動物解放》（台北：關懷生命協會，1996年）。在本書第一章（頁64-69）中，對類此「理性優越」之類理由，直指其是「物種歧視」，並有著十分綿密而有力的駁斥。

² 「論述」（discourse），是由許多「命題」（proposition）所構成的內容。而「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則是進一步將這些命題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目的是要清楚呈現出作者的思路。

要等到上述「教證」與「理證」完備之後，才展開行動的。亦即：不必然是依於孫中山先生所說「思想→信仰→力量」的「主義」建構過程，不必然是「論述先發，行動後至」。他們往往是依科普知識以瞭解現況，本諸宗教的核心價值與素樸的良知判斷，而就發為對應性的環保舉動／行動／運動。

領袖型宗教家在此所扮演的，是一種「人格典範」的特色——依於各該宗教的核心價值，本諸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發為感人肺腑的諄諄教誨，提出簡潔有力的行動宣言。

「人格典範」的宗教家，當然會有其勸說教導與行動指示，但那未必是邏輯綿密且系統周延的論述分析。由於他們有著強烈的生命情懷與感染能力，因此只要登高一呼，往往能激發起眾人「矢志追隨」的豐沛能量。追隨者以這樣豐沛的生命能量，奮力擺脫思想慣性與行為墮性的束縛，逆向躍升而發為個人的環保行動，或是加入群體的環保事工。當這些行動與事工，獲致了自利或利他的正面效應時，那些真實感人而又豐富多樣的生命故事，又透過口耳相傳與媒體報導，形成了強而有力的宗教見證，讓更多人深受感動而加入行動／運動行列。

這是在依科普知識，具體作出生態環境的事實判斷之後，滾雪球般地進行著宗教環保三部曲——「抽象的核心價值→具象的人格典範→具象的生命故事」，三者交叉印證且不斷擴延。因此我們可以比對發現：在「教證」與「理證」之外，當代宗教環保運動，必須加入精神導師與追隨者的生命故事，那是感人肺腑而激發動力的具體「事證」。

三、「理證」於宗教環保所扮演的角色

「論述分析」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即是伴隨著「宗教環保」三部曲

的進行，對文本作詮釋分析（教證）、對案例作質性或量化研究（事證），並於這兩者的基礎之上，作出哲學式的分析、綜合、歸納、演繹（理證）。

宗教環保的論述分析，有時出自宗教環保運動的提倡者與追隨者（亦即「局內人」——Inners），有時則出自旁觀宗教環保運動的學者、思想家或評論家（亦即「局外人」——Outsiders）。

「局內人」大都為這三部曲的每一感人故事或重要環節，作出紀錄、賦與詮釋，甚或萃取出共同現象與共通法則，而加以闡述、評斷，有時也會作出愛深責切的反思與檢討。

「局外人」中之思想家與評論家，基本上有其既定價值信念，這些價值信念，與該諸宗教的環保信念，有的相同而有的相左。

「局外人」中之學者，不是沒有個人的價值信念，但是精嚴的學術專業訓練，使得他們大都較為嚴謹地把持「價值中立」的分寸。

這些局外人所發表的論述，對於該諸宗教的環保理念與事工內涵，未必都會給予全盤的正面肯定，有時也會針對該諸宗教的核心價值、理念、作風、行動，乃至個案，提出他們的質疑與批評。然而即使是質疑與批評，也必須謹守「經驗檢證」與「邏輯驗證」的法則，凡是天馬行空的隨興漫談，或是含沙射影的情緒宣洩，即使形諸文字，嚴格而言都不能納入「論述分析」的範疇。

四、知、行「相即」，做、學「相入」

慈濟環保志業，自一九九〇年發展迄今，已逾二十二年，清晰地印證了如上所述「宗教環保三部曲」的發展軌跡——「抽象的核心價值→登高一呼的人格典範→眾多感人的生命故事」。

綜觀逾半世紀的慈濟志業，並非一開始就規畫出所謂的「四大志業，八大腳印」，從而架構出逐期進行各種事工的龐大藍圖；反倒大都

是一些感人的生命故事或現實場景，讓證嚴法師以悲天憫人的情懷，蘊釀出「以具體行動來改善現狀」的想法、腹案，然後感召著慈濟人共同投入。接著就由慈濟人以「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從做中學，邊學邊做。至於「四大志業，八大腳印」，那是在各種志業逐漸具足規模之後，歸納既有成果而提出未來願景的簡潔宣告。

但這並不意味著，慈濟志業純粹來自法師個人的生命悲懷與意志貫徹。事實上，整個慈濟志業，有著非常清晰、明確的佛法貫串其間。筆者以為，證嚴法師作為一位佛弟子，從頭到尾都在奉行著佛法（特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價值——「嚴淨國土」、「成熟有情」與「惜福愛物」，並依這三大核心價值，產生了「護念眾生」、「膚慰地球」與「珍惜資源」的三大行動基調，在各種時間與場合，以契理契機的開示與演說，來闡明這些核心價值與行動基調，隨著時節因緣而逐漸規畫出各種志業的項目與內容。

法師以其悲天憫人的生命情懷，親力親為地帶領著為數龐大且逐年增多的慈濟人，「行入慈濟大藏經」。茲舉三項「行入慈濟大藏經」的特質：

一、在接引對象方面，慈濟人來自知識份子、企業領袖、社會菁英、普羅大眾、社會底層乃至罪犯遊民。它真正做到了「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的淨土理想，契應著「等視眾生」的佛陀本懷！

二、在教導順序方面，法師很明確地規畫出「由善門入佛門」的願景。許多慈濟人並非先有佛教信仰，再受法師感召而投入慈濟；反倒是先接受了法師的人格感召，投入慈濟志業之後，才逐漸將佛法內化為自己的信念。乃至於慈濟人是不是必須要在形式上加入佛門？法師也相當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因此有許多社會人士與友教信徒，也歡喜地成為

「慈濟大家庭」的忠實成員。

三、在教導內容方面，可以歸納出「積少成多」的特色。法師並非滔滔雄辯的哲學家，但絕對是極富感召力與影響力的宗教家，以及洞悉人性而因勢利導的教育家。法師深知「知易行難」的人性弱點，因此她在每一時期，相應於前述核心價值與行動基調，往往只提出一、兩項簡潔有力的重點提示，跳過論述分析的枝枝節節，直接告訴慈濟人：「做就對了！」讓慈濟人將這些重點提示「信受奉行」而付諸實踐，以團隊力量互勵共勉，克服某一、兩項頑強的不良習性，作出某一、兩項自利利他的共同行動，如此緩進地徹底改造生命底蘊與生活習慣。

弟子們依於各該階段的重點提示，運用著與時俱進的科學知識，累積了豐富、有效的實務經驗，這時法師再評衡外部時勢與內部能力，作出下一階段的重點提示，訂出下一階段個人行動與群體事工的重點。

慈濟人常掛在口裡的是「佛心師志」、「做就對了」。由於「信受」佛心、「奉行」師志，起先是依於法師指令，「做就對了」。緊接著在投入之後「證實」己行——發現這果真是「做就對了」。

這時，法師再進一步提出簡潔有力的提示：「要做對的事情。」至於什麼是「對的事情」，其思想判準，恰恰來自前述三大核心價值的「佛心」；其實踐判準，則來自前述三大行動基調的「師志」。

「對的事情」未必就做得出來，除了對「佛心」與「師志」的全然信賴之外，還仰賴組織分工，規畫並執行循序漸進的教育與推廣，學習與印證，因此慈濟人依於一項又一項的重點提示，「積少成多」地發為有力行動，產生豐沛成果，終於形成力挽狂瀾的全球性運動。國際賑災如此，全球環保亦然。

在法師的人格感召下，依「佛心」（核心價值）作為源頭活水，以「師志」（行動基調）作為實踐綱領，配合著每一階段的重點提示，慈

濟人逐步、逐項地身體力行，務必要這樣緩進教學，才能達成天台學中所謂「相即相入」的效果：知、行「相即」，做、學「相入」。於做中學，邊學邊做；即知即行，知行合一。

五、「行入」以落實「社區倫理」

筆者一向是十足理性的學者，此從上述文段的論議風格，已可窺其一斑。然而即使如此，在慈濟環保志業的相關論述中，最爲觸動筆者心靈的，竟然不是綿密思辯，而是證嚴法師的如下法語：

「走路要輕、怕地會痛！」

慈濟人會自豪地說：他們是在「行入慈濟大藏經」——請注意：這是「行入」而非「理入」！這與「反智」與否無關，而是生命心靈的深邃之處，對他者處境「感同身受」的強大能力，受到了法師強大慈悲能量的激發、穿透與活化！這種「感同身受」的強大能力，儒家名之爲「良知」，佛家則名之爲「自通之法」。

依何日生教授所述：慈濟從 1991 年開始啓動環保志業，在各社區設立環保站，旨在教育周遭的鄰居，一同加入環保回收的行列。時至今日，全台灣有超過二十萬名慈濟志工，在五千多個社區環保站，投入自己的時間與精力，維護社區清潔，促進環境保護。受到慈濟志工的啓發，成千上萬的家庭，也開始在自家做起資源回收。

這些資源回收的寶特瓶或紙張等等，他們都作了妥善的再利用。例如：近年幾位實業家的慈濟志工，設立了一間盈餘全數投入慈濟公益的「大愛感恩科技公司」，將回收寶特瓶製作成毛毯，平時建立物流系統，佈點販售於全國各處，以減少庫藏壓力，一旦有國內或國際上的災難發

生，立即從各經銷點全面回收庫存毛毯，儘速送往災區，提供災民保暖安眠。

環保站吸引了不同年齡與階層的民眾。志工從三歲到一百零四歲，包括博士班學生、企業家、警察、家庭主婦與外交官。³全台灣總人口數是兩千三百萬，然則每一百一十五人中，就有一人投入其間。難道這二十萬人，都是在弄清楚了「緣起性空」、「眾生佛性」與「無情有性」的內在理路，然後才發為行動嗎？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豈不正是依於前述「宗教環保三部曲」——在「佛心」、「師志」下投入之後，證實「己行」果然「做就對了」！

有人認為，這只是「資源回收產業」龐大利潤受益者的板塊位移（從拾荒者位移至慈濟人），然而我們不妨參看何日生的如下陳述：

環保站同時也是心靈療癒和提供相互勉勵的地方，藉由參與環保回收，慢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可以因此得到心靈撫慰，進而改善自我狀態。而某些有憂鬱症、心理障礙、吸毒、賭博、酗酒傾向的受訪者，更以自身經驗證明，藉由參與慈濟環保回收活動，他們得以戒除所有不良症狀。還有一位內湖志工許金蓮，駝背將近九十度，竟在從事環保回收數年之後，逐漸從駝背的身軀，轉為直挺挺的健康身體。而慈濟環保站成爲一種新形式的佛教寺廟，提供宗教性的功能，提倡利他主義、合作、團結、謙讓，以及簡單生活的美德。⁴

同是在作「資源回收」，有人因此而得重度憂鬱症（如台灣某位卸任女性立法委員），有人卻因此而連憂鬱症、毒癮症與精神分裂症，都

³ 何日生，〈療癒地球以及人類的身心靈——慈濟環保站的草根運動〉，許木柱、何日生等編著，《環境與宗教的對話》（台北：經典出版社，2012年），付梓中，頁數未詳。

⁴ 同上註，付梓中，頁數未詳。

還可以不藥而癒！何以如此？原來，慈濟環保志業中，「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公益企業體，正是德國心靈導師古倫（Anselm Grün）神父所指出的，「價值創造利潤」⁵ 的最佳範例！

在「佛心」與「師志」的體念之中，護念眾生、惜福愛物乃至「怕地會疼」的價值信念油然而生，這牽動出了慈濟人集體強大的慈悲能量，讓志工們在資源回收的工作場域中，對於自己的所做所為，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價值感。有此價值信念作為前導，因此志工們在工作時，所思所念不是「拾荒者」的無耐與悲情、不是「社會邊緣人」的屈辱與絕望，而是「愛惜物命，守護地球」的無比尊榮與無限柔情。這使得他們逐漸體會到身心靈、家庭、社會、眾生乃至土地綿密共生、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則，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無緣大慈」的生命能量，融入了「同體大悲」的生命海洋。這一連串的運作機轉，具體呈現出身心靈、家庭、社會乃至土地的療癒成果。

六、結語

慈濟從「全球」的環保志業，落實到「在地」的資源回收，然後又從「在地」的資源回收，落實到作為「全球」賑災用途的高科技寶特瓶毛毯。它是一個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最佳實例。

慈濟環保志業的成就如何？看得到數目字的成果，在此姑舉數例：由於慈濟投入環保志業，台灣的資源回收率由 1990 年代的 9.8%，到二十世紀末期，已提高 38.6%；台灣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已從 1.143 公

⁵ Anselm Grün & Jochen Zeitz, *Gott, Geld und Gewissen*. 吳信如譯，《金錢與良心》第六章：「價值創造利潤」（台北：南與北出版社，2012 年），頁 123-148。

斤，大幅下降至 2008 年 0.584 公斤的新低。⁶

然而更多無法估量的貢獻，更值得我們注意。在資源回收與處理作業的在地環保志業中，我們看到慈濟人落實「社區實踐倫理」的成功典範。這些療癒成果，到底節約了多少全民健保的國家成本？到底促成了多少生命活力、生活品質、整全家庭、幸福社會與清淨國土？這些總體效益，實在很難作精準的量化表述。

因此本文作者以「佛教局內人」與「慈濟局外人」的雙重身份，略述「宗教」與「環保」之間，教證、事證與理證之間，「佛心」、「師志」與「己行」之間，「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邏輯辨證的層層環扣與串串鏈結如上，用以就教方家。

【後記】

本篇論文之初稿，係筆者應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教授邀，於 2012 年 1 月間，為《環境與宗教的對話》論文集所撰序文。

後台灣生命倫理學會理事長蔡篤堅教授，邀筆者於 2012 年 6 月初之「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年度會議——生命倫理與認同群體研討會」發表論文，由於邀筆者發表場次之子題是【社區實踐倫理的典範】，筆者立即想到慈濟環保志工之範例，倘稱之為「社區實踐倫理的典範」，實亦當之無愧。乃就原序文作一增刪而草成本文。

對照原序文，增益部分約計 1200 餘字，刪除部分約計 670 餘字。刪除的是文末之如下片段：

《環境與宗教的對話》研討會的召開，是在慈濟人投入環保志業二

⁶ 同註 3，付梓中，頁數未詳。相關療癒成果的質性陳述與量化分析，在《環境與宗教的對話》一書中，觸處可見。

十年後。也就是說，是在慈濟人業已於證嚴法師號召下，純熟地奏起了慈濟環保三部曲之後。更精確地說，這是在「佛心→師志→己行」為經，「做就對了」為緯，長達二十年來，進行著「從（佛）正理啟（師）信願→從（師）信願發（眾）信願→從（眾）信願至（眾）篤行→從（眾）篤行契（佛）正理」的滾動式歷程，且已產生十分輝煌的具體成果之後，在內外因緣成熟的評估下，由慈濟人文志業發展處所主導、規畫出來的宗教學術盛筵。

本次研討的發表人，有慈濟志業體的「局內人」——含職工與志工、理論家與實踐家，有非屬慈濟的「局外人」——對慈濟環保運動給予全然肯定、部分肯定乃至質疑批判的學者。這就為宗教性的環保論述，提供了理性溝通的「學術交流平台」。

其次，本研討會從一開始，就把主題定調在「環境與宗教的對話」，對話內容不僅「佛教」或「慈濟」，還包含了諸宗教的環保論述。這就為各宗教的環保觀，提供了友善的「宗教對話平台」。這使得研討會的議題與論文的内容，相當豐富而多元。

因此在研討會後，這些質精量多的研究成果，確實有其輯為專書的必要，它兼具學術性與宗教性，可以作為慈濟人相互印證、省思檢討、教育推廣的良好教材；它也可以成為局內、外人作相關議題研究之時，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慈濟人文處主任何日生教授向筆者索序，這讓筆者不得不強制自己忙中撥空，非讀不可，因此竟然產生了「先讀為快」的無量法喜！因茲略述「宗教」與「環保」之間，教證、事證與理證之間，「佛心」、「師志」與「己行」之間，「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邏輯辨證的層層環扣與串串鏈結。

是為序。

參考書目

一、專書

許木柱、何日生等編著，《環境與宗教的對話》，台北：經典出版社，2012年。

Anselm Grün & Jochen Zeitz 著，吳信如譯，《金錢與良心》，台北：南與北出版社，2012年。

Peter Singer 著，孟祥森、錢永祥譯，《動物解放》，台北：關懷生命協會，1996年。